

中欧经济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王宸

日前,在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中德两国签署了在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的谅解备忘录,人民币国际化开辟离岸市场再下一城。已经深入到欧洲大陆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此外,习近平主席还亲自见证了“渝新欧”新丝绸之路、中欧陆路大通道的第一趟列车驶达终点,中欧合作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中欧合作的快速发展、全面发展,无疑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的动力,人民币在欧洲大陆落地将形成国际化以来一个明显的加速时期,这有助于均衡不同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差异与波动,在形成更广泛的市场基础之上,人民币离岸汇率将更加反映价值,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支付结算、投融资等领域的快速增长也将实现。

支持欧元的回报

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言,德国感谢中国支持欧元,在金融危机引发欧洲风暴和欧元危机以来,中国始终坚定地秉持支持欧元的立场,并投入巨资购买了欧元区不同国债,在举世担忧欧元崩溃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的支持给了欧洲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一方面是欧元危机,另一方面是人民币坚挺,在这种强

烈的反差之下,欧洲一直在积极地引入人民币支付使用、谋求开辟人民币离岸市场,中欧双方坚持不懈地加强合作、互利共赢的努力,在欧元危机渐行渐远之后,终于以开辟人民币离岸市场、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的方式,结出了累累硕果。这既是两大经济体正常合作发展的需要,也是双方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从全球视野来看,中美欧作为三大经济体,基本奠定了亚欧美三大洲和世界经济的格局和重心,从更广泛的全球合作机制来看,在20国集团机制中,中美欧也占据重要分量,中欧双方分别代表了发达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双方的全方位战略合作在世界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中举足轻重。此次中欧双方在法兰克福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由于除了德国央行之外,欧盟央行总部也在法兰克福,因此,中欧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之后,中欧双方之间的货币清算机制、双边结算机制也呼之欲出,中欧在经贸、科技合作的历史基础上,迈上了全面金融合作的新历程,中欧合作一定会像中德两国从战略合作走向全面战略合作那样,开辟崭新的更具远大前景的未来。

中国已经早将欧元纳入外汇储备,在欧元危机时期也是如此,作为支持欧元的回报,下一步欧洲很可能会提前将

人民币纳入国家储备,据报道,一些中东欧国家2013年就已经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而德国奔驰已在中国发行“熊猫债券”,德国戴姆勒公司也已在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标志着中欧之间在深化金融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上欧洲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债券,特别是将要在法兰克福出现的人民币债券,中欧在金融合作上已经具有了很高的起点。可以说,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欧亚合作将继续深化

中欧双方的高层互动一直比较频繁,中欧双方的深化合作已走在世界经济的前列,特别是“新丝绸之路”的发展,将欧亚广大的腹地地区带动起来,包括中亚、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等,在中欧加深、加快合作的前提下,将首先被中欧陆路大通道带动起来。与此同时,甚至更早,借助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发展,人民币在中亚已经广泛地被用于国际贸易支付结算,人民币国际化与中欧合作、带动中亚几乎同步,只不过这还是一个比较不容易被重视的领域。此次习近平主席访欧,中欧合作出现突破性进展,人民币落地欧洲、进入中亚腹地等的前景越来越清晰,也是国际化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从中欧合作发展的更远的前景来看,欧盟或者欧元区是重要的部分,中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欧合作发展

可以通过中亚辐射广大的中东海湾地区,从而几乎形成一个广义上的欧亚经济合作机制,这样的前景是值得中欧双方去努力的。但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看,人民币走向世界,走向欧洲、中东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反而反映出人民币国际化更为领先的一面,人民币早在中欧合作、辐射中亚之前,不仅被欧亚大陆各国广泛认可,还早已开辟了非洲的支付结算领域。

中欧金融合作发展到新时期

毫无疑问,人民币清算机制在欧洲大陆的建立,代表着中欧金融合作发展到了新的历史时期。下一步,中国的支持欧元,欧洲在使用人民币等相互合作的过程中,人民币与欧元将成为主导广泛的欧亚大陆的两大主要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元在欧亚大陆上的日薄西山几乎已成定局。随着欧洲经济回暖,全球资金重新涌入欧洲,外商投资流入中国也一直保持较高的速度和水平,这正是中欧两大经济体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最好反映。在中欧加强和深化金融合作的前景中,相互放开市场、相互投资协定等诸多具体举措的逐项落实,将为中欧金融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应该曝光“不当说情者”

皮海洲

3月28日,证监会发布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和监管执法事项不当说情备案规定(试行)》,正式对“不当说情者”说“不”。该“备案规定”,就“不当说情”行为进行了界定,专指在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日常监管和案件调查、审理工作中,当事人自己或请托他人针对某一具体事项,在正常程序之外,对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施加不当影响,以谋取利益或减轻责任的行为。列举了“不当说情”四种情形,还要求经办人员在不当说情情形发生后立即填写《不当说情备案表》,并报送所在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登记归档,录入相应的信息系统,并及时报备中国证监会监察局。同时证监会还要求工作人员自觉拒绝请托说情。

可以说,在对于“不当说情”的问题上,证监会这一次动了真格。可以相信,随着《备案规定》的实施,一些登门说情者将会知难而退,权力寻租的空间也因此得以压缩。证监会此举在我国政府机关中开了一个好头,值得大力推广。不过,为了更好地保障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和监管执法工作的公正性、独立性,切实维护社会公开、公平、公正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证监会的这项“不当说情备案制度”可以再向前推进一步,即在备案的基础上,对“不当说情者”进行曝光。其积极意义至

少包括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是更有利于让“不当说情者”知难而退。毕竟对于“不当说情者”来说,只是对不当说情行为进行备案,这还为其保留了一些脸面,而如果是将“不当说情者”予以曝光,并将备案的相关信息一并公开,如此一来,“不当说情者”颜面扫地。也正因此,“不当说情者”又怎敢轻易登门做说客呢?可以说,将“不当说情者”曝光较之于将“不当说情备案”的做法更有震慑力。

其次将“不当说情者”曝光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一是对“不当说情者”进行社会监督,监督其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更多的利益关系,或其他不法勾当。在社会监督面前,如果“不当说情者”自身不正的话,是很容易原形毕露的。二是对证监会查处的相关案件也可以起到社会监督作用,避免证监会工作人员对相关案件的查处受到“不当说情”的影响,以确保证监会执法工作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其三,有利于减少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资本市场的干预。比如在对一些上市公司的查处上,包括上市公司退市的问题上,总会有来自地方政府部门的干预。如果能够将这些地方政府部门的不当说情予以曝光,这些地方政府的颜面也就丢尽了。这些地方政府部门自然就会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干预,证监会也可以因此而挺直腰杆来公正执法。

警惕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房价先行”



京津冀谋一体化,房价闻讯涨幅大。应景题材遍地是,炒作概念随手抓。区域协同多斟酌,地缘合作细规划。发展大局顾长远,莫为地产所绑架。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金融风险意识需要健全制度引导

项峥

近日,江苏射阳某银行因“倒闭”谣言扩散,面临大量储户挤兑,表明社会公众的金融风险意识非常强烈。而与之相冲突的是,过去很多社会公众不顾金融风险盲目追逐高收益财富管理产品,反映出金融风险意识的淡薄。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情况表明,由于制度与经历上的差异,相同的人群在面对金融风险时可能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因此,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需要进一步建立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在内的各种金融基础性制度,并不断完善,给社会公众一个合理的、稳定的预期,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我国个人投资金融产品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风险逆向选择。在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在影子银行领域里,我们发现很少有投资者真正关心金融产品可能面临的风险,真正去关注金融产品所对接项目运行的盈利前景。这与投资于股市的个人投资者具备明显的金融风险意识存在明显反差。在证券市场,不乏一些不具

备经济金融专业知识的投资者绘声绘色分析个股的盈利前景与风险。就金融风险而言,影子银行体系金融产品运行风险要明显大于股票价格波动风险。理论上,影子银行市场投资者应该比证券市场投资者更加关注金融风险,投资行为也要更为谨慎。但实际上,很多投资者并不根据金融风险大小进行投资行为决策,看似全民的金融风险偏好有了较大幅度提升,而真实经济景象则是,作为经济社会的主要参与者,我国社会公众并不缺乏金融风险意识。在过去的若干时间点上,当面对投资损失时,部分社会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时甚至会发生不理性的过激行为。近日江苏某银行的挤兑风波就是一个明证。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金融制度的缺失。由于金融风险治理与安排的制度缺失,我国金融市场主体承担了自身所不能承担的金融风险。至今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因而事实上国家信用仍为全体存款人买单。而金融机构退出机制不健全,中央银行再贷款将无底线地

承担金融机构经营失败风险,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冒险倾向。刚性兑付的微观理性,撑起我国数十万亿的影子银行体系规模,造就了宏观非理性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影子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教育尚未真正进行,也是金融市场风险偏好不恰当上升的原因之一。从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发展的过程中,也多次出现投资者群体性事件,但国家并不因此向这些投资者让步,仍然坚持投资者风险自担。经过多次金融风险教育的洗礼,证券市场投资者已经较成熟,能够自行承担投资失败风险。可见,过去多次影子银行金融产品兑付危机都以各种不同方式解决,投资者获得全部本息,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刚性兑付问题。

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可以合理预期,今年我国在加强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方面将有实质进展,而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实体经济运

营风险加快向金融领域传导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可以起到托底的作用。以存款保险制度为例,如果我国已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那么江苏某银行的挤兑风险事件将不会发生,谣言也将不攻自破。健全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使得市场对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风险处置过程有一个合理预期,降低了金融风险传染与扩散的可能性。当然,当一项基础性金融制度被宣布建立后,有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波动,为减少这种短期内影响,可以宣布建立相关制度后设定一个相对较长的政策观察期,以缓释政策层面可能引发的波动。

从各方面情况看,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在金融市场风险逐步暴露的情况下,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使其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慎监管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一道,构筑我国的金融安全网,有效引导投资者风险决策,积极维护金融稳定,这也是应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同时金融体系运行风险上升的有效对策。

从“平度事件”看集体土地流转程序再设计

李宇嘉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实现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赋予农民财产权利”等方面的表述,让我们对集体土地流转带来的改革红利无限憧憬。但是,近期“平度血征强拆事件”的发生,着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事件不仅昭示出改革红利的获得是多么艰难、代价是多么高昂。而且,事件本身暴露出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设计集体土地流转在程序上孰轻孰重、孰先孰后。

事件的发生有一个大背景,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就是继续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在破题上的一段时期内,集体土地仍旧必须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进行流转。这其中,符合规划指的就是城乡土地利用实行不同的规划控制,而符合用途管制指的则是,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用途上的二元管制不能变,集体土地若想进入房地产市场,必须要走政府征收的程序。但是,实施规划和用途管制的权力掌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这不仅意味着创造集体土地市场化溢价的权力(城乡规划)在地方政府,而且实现这种溢价的权力(土地征收)也在地方政府。因此,基于土地集约节约和保护耕地的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其在政策上的任何探索(如本案中的“增减挂钩”),都有可能变异为地方发展经济和谋求自身利益的“合法外衣”,牺牲掉的则是农民的土地权益。

另一方面,即使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会提高,但仍旧在原用途(农业生产)若干倍的框框内“打转转”,依旧无法以市场价格作为标杆。因此,集体土地流转的主导权、政策上的解释权就必然掌握在地方各级政府的手中,也就无法真正实现“自主流转”、“同地同权”、“平等交换”。而不久的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将会如火如荼地推进,更多的农村集体土地将被纳入到城市化的大潮中,在信息极其不对称、谈判地位极其不平等、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饥渴丝毫不见缓解的情况下,想让“平度事件”成为个案似乎很难。

在“平度事件”中,对于严格执行征地程序,从山东省到青岛,再到平度市,三级政府的国土资源部门有意无意的疏漏让人吃惊,直接导致了在征地合法性、安置补偿方案上,农民彻底丧失了知情权,以及申请协调和裁决权、行政复议权和诉讼权。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政府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跨越式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以及上级政府对于规划和发展的支持,而非是征地程序是否合法,更不是农民财产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当地官员拆迁动员会上的明确指示道出了这一潜规则,“不签协议不罢休,一腾房屋不收兵”,“为了发展,在个别工作程序上有点瑕疵、出点问题,可以宣布建立相关制度后设定一个相对较长的政策观察期,以缓释政策层面可能引发的波动。”

从各方面情况看,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市场基础性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在金融市场风险逐步暴露的情况下,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使其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审慎监管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一道,构筑我国的金融安全网,有效引导投资者风险决策,积极维护金融稳定,这也是应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同时金融体系运行风险上升的有效对策。

经济业绩、主政官员的经济利益面前,变得轻如鸿毛,更遑论对于村民土地权利的保障。产生这两个问题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实施城乡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的权力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没有向市场价格看齐。而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随意实施规划,随意实施用途管制来剥夺农民享有土地实际占有的权利、增值的权利,而补偿之所以没有向市场价格看齐,根源就在于农民对于土地财产的权利没有落到实处。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在村集体治理结构严重扭曲,民主生活缺失,集体所有权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农村集体土地控制权实际落入村干部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集体土地入市溢价的这块肥肉摆在面前,而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等和法制保障的不力,事实上让这块肥肉完全落入到村干部的手中,并通过“平度式村干部”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勾结瓜分,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腐败盛行。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化、经济增长政绩的诱惑下,上级政府也被基层政府俘获,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更加难以保障,而向上诉求的渠道也被堵塞,“暴力式自救”的现象就必然会发生,基层社会面临着极其不稳定的局面。

因此,做实产权要先于流转,也优于流转,要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地同权、平等交换”真正落地,将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上升到财产的高度,这是推进集体土地流转改革的长效之策。甚至,为做实产权,即便在短期内暂停流转,也是非常必要的。若非如此,“平度事件”必然会再次上演。而且,土地权利落地了,集体土地产权虚置的问题也就改观了。有恒产者有恒心,也就有了民主生活的物质基础和激励,也就解决了“村干部”控制的问题,这是解决村集体治理结构扭曲的唯一途径。不然的话,“平度式村干部”既抓不完,也杜绝不了。

近日,不动产登记部联席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部际联席会议召集人、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会议上的讲话,道出了建立这一制度的归结点,那就是“注重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财产权,注重保障不动产交易安全,注重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和水平”。对于基层广大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亟待通过统一的登记来实现,这是整个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的底层基础。

长期以来,包括宅基地、耕地、集体建设用地在内的各类集体土地权属登记信息残缺和混乱的问题本身就非常严重,再加上内部人控制、权力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土地在集体内流转或得到保障。当地官员拆迁动员会上的明确指示道出了这一潜规则,“不签协议不罢休,一腾房屋不收兵”,“为了发展,在个别工作程序上有点瑕疵、出点问题,可以宣布建立相关制度后设定一个相对较长的政策观察期,以缓释政策层面可能引发的波动。”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8@126.com。